

高等医学院校选用教材

(供成人教育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使用)

中医病因病机学

赵存娥 李明奎 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0

本套教材编写委员会

审订委员会主任 陶功定

编写委员会主任 白兆芝

总 主 编 张俊龙

副 总 主 编 施怀生 刘 星 王亚达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门九章 马彦平 毋桂花 王亚达 王茂盛

王晓鹤 冯 明 冯俊婵 白兆芝 乔 模

任建国 刘 星 师建梅 邢维萱 闫润红

张克敏 张俊龙 李 晶 李明磊 邹本贵

苗润田 施怀生 赵存娥 赵尚华 赵建浩

贾丽丽 项 祺 秦艳红 康 永 冀来喜

前言

我国的成人教育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中医药学作为我国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时至今日,我国尚无专供中医药成人教育尤其是全日制中医药成人教育使用的系列教材,而统编教材和其他类教材,无论从内容还是要求上都难以切合成人教育自身特点,不能较好满足成人教育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为了提高中医药成人教育教学质量,促进中医药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广泛调研和多方论证的基础上,组织了多年从事中医药成人教育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及有关专家,着手进行了适应于医学院校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成人教育教学需要的系列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工作。

本套教材紧扣成人教育特点,遵循成人教育规律,编写过程中,注意把不同的学科置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整体学术体系中,注重经典著作、基础理论和临床学科之间的合理衔接,力求避免学科的割裂和内容的重复,从而体现中医、中西医结合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关系,在重点介绍具有实用价值的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同时,适当吸收了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中医药研究的新进展、新技术和新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根据新形势要求,从课程性质、任务出发,注意构筑中医药成人教育人才知识与能力素质结构,强调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为便于成人学员更好地自学自修、掌握课程重点内容、理解难点疑点问题、全面检查学习效果,教材在每章节增列了目的要求、重点内容及复习思考题,教材后还附有 2~3 套模拟试题及答案。

全套教材计有中国医学史、中医学导论、中医藏象学、中医病因病机学、中医防治学、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肛肠病学、中医皮肤病学、针灸学、推拿学、内经教程、伤寒论教程、金匱要略教程、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西医结合急症学、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与流行病学、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中药药理学等 31 门。

此外,根据国务院国发[1993]39 号《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这两种药品已停止供药用,本套教材中古医籍或方剂涉及这两药时,仅供参考,建议使用其代用品。

鉴于目前中医药成人教育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系统教材的编写尚无

更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在教材的编写中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但考虑到中医药成人教育蓬勃发展的需要,我们不揣自陋,在成人教育教材建设上进行了此项尝试。可以肯定,本套教材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因而希望同行和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和改进,从而为我国中医药成人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委员会

2000年5月

编写说明

本教材由高等医学院校选用教材(供成人教育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使用)编写委员会组织编写,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系列教材之一,可供全国成人教育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研究中医及自学中医者的学习参考书。

《中医病因病机学》是研究和论述引起人体疾病的病因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机理的一门学科,是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依据。全书包括绪论、病因、发病、病机和病势等五章。绪论章概述了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发展渊源、主要特点、主要内容、性质、任务和学习方法;病因章详述了各类致病因素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发病章概要叙述了发病的基本原理,影响发病的因素,致病途径、方式,发病类型;病机按基本病机和系统病机阐述了各类病机变化;病势简要论述了病邪出入、病性转化、病位传变和疾病的转归等。可以说,《中医病因病机学》是在学习了《中医学导论》和《中医藏象学》之后,探讨疾病从发生发展到转归全过程的基础理论知识,是以后学习中医诊断学、中医防治学和临床各科的前提。

由于中医病因病机学所涉及的内容很丰富,其理论和内容又较分散,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统编和规划教材及数家兄弟院校中医基础学科教材的编写经验,收集整理了历代和当今医著的有关论述,结合教学科研医疗实践的体会,编写了本教材。为了既要反映出中医药学传统理论的特色,又要注意到中医药学顺应时代发展之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到成人教育的特点,故在书中分列了目的要求、重点内容、复习思考题、模拟试题,并附上现代脏象研究成果部分资料,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医学的教学、科研与临床工作,为发展中医、提高中医做出努力。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十分仓促,书中难免存在许多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同行提出宝贵意见,以利于进一步修订与提高。

编 者

2000年5月

• iii •

目 录

前言 编写说明

1 绪 论

- | | |
|-------------------------|------------------------------------|
| 1.1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源流概况 … (2) | 1.3.1 病因学部分 …… (13) |
| 1.2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主要特点 … (11) | 1.3.2 发病学部分 …… (14) |
| 1.2.1 整体观念 …… (11) | 1.3.3 病机部分 …… (15) |
| 1.2.2 审证求因 …… (12) | 1.4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性质、任务
和学习方法 …… (18) |
| 1.3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主要内容 … (13) | |

2 病 因

- | | |
|-----------------------|-----------------------|
| 2.1 外感病因 …… (22) | 2.3.2 瘀血 …… (40) |
| 2.1.1 六淫 …… (23) | 2.3.3 结石 …… (41) |
| 2.1.2 疔气 …… (29) | 2.3.4 增生 …… (42) |
| 2.2 内伤病因 …… (31) | 2.4 其他病因 …… (44) |
| 2.2.1 七情内伤 …… (31) | 2.4.1 外伤 …… (44) |
| 2.2.2 饮食失宜 …… (34) | 2.4.2 寄生虫 …… (46) |
| 2.2.3 劳逸过度 …… (35) | 2.4.3 遗传与胎传因素 …… (48) |
| 2.3 病理产物形成的病因 …… (37) | 2.4.4 药邪 …… (50) |
| 2.3.1 水湿痰饮 …… (38) | 2.4.5 医过 …… (51) |

3 发 病

- | | |
|---------------------|---------------------|
| 3.1 发病的基本原理 …… (53) | 3.1.1 邪正与发病 …… (54) |
|---------------------|---------------------|

3.1.2 邪正胜负与发病	(55)	3.3.2 致病方式	(63)
3.2 影响发病的因素	(56)	3.4 发病类型	(64)
3.2.1 正气自虚与发病	(57)	3.4.1 感邪即发	(64)
3.2.2 外界环境与发病	(57)	3.4.2 伏而后发	(65)
3.2.3 体质因素与发病	(58)	3.4.3 徐发	(65)
3.2.4 情志因素与发病	(59)	3.4.4 继发	(66)
3.3 致病途径与方式	(60)	3.4.5 合病与并病	(66)
3.3.1 致病途径	(61)	3.4.6 复发	(66)

4 病 机

4.1 基本病机	(72)	4.2 系统病机	(93)
4.1.1 邪正盛衰	(74)	4.2.1 外感热病病机	(94)
4.1.2 阴阳失调	(78)	4.2.2 脏腑病病机	(105)
4.1.3 气血失常	(83)	4.2.3 内生五邪病病机	(163)
4.1.4 津液代谢失常	(89)	4.2.4 经络病病机	(170)

5 病 势

5.1 病邪出入	(176)	5.3.2 脏腑传变	(183)
5.1.1 表邪入里	(177)	5.3.3 三焦与卫气营血传变 ..	(185)
5.1.2 里邪出表	(178)	5.4 疾病的转归	(186)
5.2 病性转化	(178)	5.4.1 痊愈	(187)
5.2.1 寒热转化	(179)	5.4.2 迁延	(187)
5.2.2 虚实转化	(181)	5.4.3 恶化	(188)
5.3 病位传变	(182)	5.4.4 死亡	(188)
5.3.1 经脉传变	(182)		
模拟试题			(189)

目的要求

1. 了解中医病因病机学的源流概况。
2. 掌握中医病因病机学的特点。
3. 了解中医病因病机学的主要内容。
4. 了解中医病因病机学的性质、任务和学习方法。

重点内容

1.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源流概况。
 - (1)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奠定了病因病机学基础。
 - (2) 汉代《伤寒杂病论》推动了病因病机学发展。
 - (3) 隋唐时期著成——《诸病源候论》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书。
 - (4) 宋代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和研究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
 - (5) 金元时期对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 (6) 明清时期为中医病因病机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 (7) 建国以来，对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多学科研究，成绩卓著。
2.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主要特点 包括整体观念，审证求因两个方面。
3.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主要内容。
 - (1) 病因部分：包括外感病因，内伤病因，病理产物形成的病因和其他病因。
 - (2) 病机部分：包括基本病机（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津液代谢失

常), 系统病机 (外感热病病机、脏腑病机、内生五邪病病机、经络病病机)。

4.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性质、任务和学习方法。

中医病因病机学, 是中医理论中研究和论述引起人体疾病的病因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机理的系统性理论。它是从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分化出来的新学科, 以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为指导, 以藏象经络理论为基础, 以临床实践观察为依据, 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机理和规律, 阐述这些变化与临床实践的关系。因而中医病因病机学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依据, 它反映了中医学理论的基本特色。

1.1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源流概况

祖国医学的病因病机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是中国人民长期在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早在远古时代, 就已经有了关于病因的认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免遭风雨和野兽的侵袭, 构木为巢, 栖身树上, 即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后来人们又开始建筑房屋以保护身体、防止风寒雪霜侵袭, 这说明, 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界气候的变化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使之产生疾病, 必须设法防御它。

病因和疾病最早的历史记载, 是甲骨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 20 余种疾病的名称, 如疾首、疾目、疾耳、疾腹、疾子、疾盲等。有些疾病还根据其病证特征给予一个名称, 如疟、疥、蛊、齕等。另外, 甲骨文中还有“疾年”的记载, 即指疾病的多发之年, 相当于流行病。

西周时期, 在《山海经》等古典著作中出现了疾病的病名, 如瘕疾、癭、痔、痈、疽、疥、痹、风、疟、狂、疫等, 在症状方面也有噎、呕、聋、痛等。这比甲骨文按部位论疾有了很大的进步。

随着农业、天文、历法的发展, 西周时期人们已观察到天象、季节、气候及某些地区的特殊自然条件与人体的健康及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如《周礼》记载: “春时有痾首疾, 夏时有痒疥疾, 秋时有疟寒疾, 冬时有嗽上气疾”。指出季节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疾病的影响, 即发生些季节性的流行病和多发病。《礼记》记载: “孟春行秋令, 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 则民多疾疫。”说明气候反常、太过、不及可致人生病。

这一时期, 最突出的病因学成就是医和的“六气致病说”。《左传》记载了秦国名医医和在为晋侯诊病时指出“六气曰: 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 序为五节, 过则为菑。阴淫寒疾, 阳淫热疾, 风淫末疾, 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这一论述为六淫致病和劳伤思虑病因奠定了基础。其中, “阴淫寒疾”, “阳淫热疾”即阴阳失调病机理论的基础, 是后世的“阴盛则寒”, “阳盛则热”之意, “风淫末疾, 雨淫腹疾。”又与后世风湿四肢关节痹痛及湿盛腹泻等证有着源流

关系,“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与后世的劳倦内伤和思虑耗伤心神有着相似的致病因素。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医学有了很大发展和成就,出现了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典籍《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内容十分丰富,从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机、病证、诊法、治则、针灸、摄生等方面进行全面阐释,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病因病机的论述成为后世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病理变化及防治最主要的理论根据。在《黄帝内经》中关于病因病机的阐述极其丰富,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黄帝内经》唯物地看待疾病发生的原因,摆脱神权思想的束缚,客观地从“天人合一”观点,即人与自然界对立统一的整体观念思想指导下,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如《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又在神形统一的理论基础上,从患者本身找原因,指出了情志变动可成为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喜怒伤气”,“暴怒伤阴,暴喜伤阳”。以上这些论述是后世的六淫外感和七情内伤病因学形成的基础。此外,《黄帝内经》也提出饮食劳逸致病的理论,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灵枢·百病始生》说:“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因而强力,肾气乃伤。”《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若入房过度,则伤肾。”这些都是现在病因的主要内容。

《黄帝内经》阐述了致病因素侵入机体的途径和方式。指出外邪致病由表入里的传变过程。外邪先自皮毛、肌腠、络脉、经脉、筋骨,而后进入脏腑。如《灵枢·百病始生》说:“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内伤发病,则损伤气血,侵害脏腑,生理功能障碍,变生各种病证。同篇指出暴饮暴食,则胃肠络脉伤;出血与寒凝结不散,则生积块。

《黄帝内经》对发病的基本原理阐述非常正确。指出邪气侵犯人体引起疾病的发生,必须是在正气虚损的前提下才可发病。若正气不虚,邪气是难以侵害人体而发病的。如《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同时强调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基本因素,《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以及《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这些论述的指导下形成了完整的发病原理,即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邪气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这种发病学的理论完全符合辨证法思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黄帝内经》阐述了阴阳失调是一切疾病病理变化的总纲。《黄帝内经》将阴阳的概念和阴阳学说的内容,引用到中医学的领域里来,解释人的生理是阴阳协调平衡,病理是阴阳失调,即阴阳的偏盛偏衰,诊断上先别阳证、阴证,治疗上调整已经失调的阴阳使之恢复到协调平衡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

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素问·调经论》说：“阴虚则内热，阳虚则外寒”。这些论述用阴阳失调概括病理的总纲就是“阴盛则寒”，“阳盛则热”，“阴虚则热”，“阳虚则寒”。有效地指导着临床辨证论治。从此，阴阳学说就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内经》专题讨论了以“六淫”“五脏”为纲归类疾病的病机变化，就是《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热瘈瘲，皆属于火。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慄，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热。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附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这些论述以症状探求病机，成为后世研究病机分类的重要内容。《黄帝内经》关于温热病的论述是后世温病学派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在病因方面，提出了疫气，并说具有传染性。如《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在病机变化方面，提出了伤于寒而病热的转化，如《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些理论对《伤寒论》的表寒不解入里化热的理论及温病学派的形成起了基石的作用。

在《黄帝内经》中提出了病和证的概念。提出了证有阴证、阳证、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这是后世八纲辨证的先导。所提到的病有热病、疟病、消瘴、痿、痹疽等。根据不同的病证阐述了疾病的传变方式，如脏腑经络传变、六经阴阳传变、卫气营血传变等。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说：“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素问·热论》指出有病在三阳和三阴的不同，即指三阴经和三阳经。

关于虚实和气血的病机《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调经论》说：“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邪正盛衰的虚实病机和气血失调病机的精髓所在。由此可见，《黄帝内经》的理论非常显著而普通地运用了相反相成的道理，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对立面认识疾病的基本规律。在脏象学说中，还系统地阐明了五脏六腑的病变表现，为脏腑病机开创了先河。

关于“体质”《黄帝内经》也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着眼。《灵枢·顺逆肥瘦》指出，视体型主要包括观察体型的肥瘦长短；皮肉之厚薄坚松；肤色之黑白苍嫩的差异。其中，尤以肥瘦最为重要，对后世医家启发很大。《灵枢·本藏》从五脏六腑的大小、位置、坚脆、长短、厚薄等方面进行阐述，指出脏腑的形态和功能特点是构成体质的要素。《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讨论了气血的多少与体质的关系。而且讨论个性特征时，皆将“形”、“性”、“气血”并论。所谓“性”即心理特征，其差异受先天禀赋、社会地位、精神刺激、饮食居处等诸因素的影响，这为近代体质学说的研究提供了原始理论依据。当然，体质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关系也极为密切。

以上几个方面,虽不能详尽《黄帝内经》关于病因病机的论述,但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为后世病因病机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追述其源,比《黄帝内经》还要早的医著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该书在病因方面,除金刃、虫兽伤以外,尚有自然界风和湿等致病因素的记载。如《五十二病方》指出:“伤痉(破伤风)者,……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屈。索痉(子痼)者,如产时居湿地久。”这不仅认识到了破伤风、子痼病是因伤口受外来致病因子即风、湿作用后发生的,而且已经在审证基础上,迈出了求因的一步。

汉代,病因病机学有着划时代的发展,主要成就是张机的《伤寒杂病论》问世。后经晋太医令王叔和把此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部。张氏对伤寒的研究,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阐明伤寒与热病的因果关系。他认为伤于寒是外感热病的本质。《素问·热论》以三阴三阳为纲,阐述外感热病的病理过程,张氏继承和发展了这个理论,创立六经学说,系统阐明外感热病各阶段,各层次的顺逆变化及其证治规范。由六经代表了疾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脏腑相传的规律,后世对六经学说的应用与评价,也并不局限于伤寒,对临床各种疾患的辨证论治,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伤寒论》是中医学成功地应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著,《金匱要略》以脏腑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证,记载了40多种疾病,262首方剂。它将虚劳、黄疸等内伤杂病的病因和证候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病因学说。如《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给后世的“三因学说”以深刻的影响。

汉代还有托名于华佗的《中藏经》,详论脏腑虚实寒热和生死逆顺的关系,该书将分散杂述于《黄帝内经》、《难经》数十篇章中的脏腑生理、病理、脉证及脏腑与四时阴阳的关系,综合成系统的脏腑辨证理论。

隋代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医第一部阐述病因、病机和证候的专著。全书分六十七门,记载证候论一千七百余条,每候分述病因、病机和症状,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对传染病、地方流行病、寄生虫病等的病因学研究,颇有精辟的见解。例如,书中对“蛊毒”、“沙虱”等具有传染性的病因,从其传染途径、传播方式、致病机理、临床表现上,都有系统的描述。又如,在《瘟病候》中,认为瘟疫病的病因是“乖戾之气”,而且还“多相染易”。在病源方面还有新的理论探索,如对疥疮病,指出:“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对寄生虫的感染,说寸白虫是因吃不熟的牛肉所致。《漆疮候》说:“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这说明本病的发生与体质禀赋有关,成为体质发病较早的论述,也是“过敏体质”的首言者。对“消渴病”,在《卷五·消渴候》中说:“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对“脚气病”,在《卷十三·脚气缓弱候》中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对“麻风病”,称“癩病”。在《卷二·诸癩候》中说“凡癩病……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如虫行……令人顽痹,或汗不流泄。……身体遍痒,搔之生疮,……或顽如钱大

……锥刺不痛，……眉睫坠落，……鼻柱崩倒……彻外从头面即起为疱肉，如桃核小枣”，这些准确的描述类似于今人对消渴病、麻风病的认识，很符合实际。

该书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对疾病的记载很广泛。书中所列的主要病类，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呕啰、痔漏、痈疽等。以内科为主，包括了外、儿、妇产、五官等各科内容。分类又很详确，如妇产科分妇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等五类，其中有月经不调、白带、阴挺、乳痈、妊娠恶阻、难产、产后恶露等，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这么高水平的医学知识，对中国医学及世界医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唐代王冰注释《黄帝内经》对运气发病之说大有发展。他在《素问·六节藏象论》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五运六气与人体生理活动、发病以及病变过程的密切关系。由于运气学说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可称之为中医气象医学理论的代表。

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总结出用动物甲状腺防治甲状腺肿大；用动物肝防治夜盲症。他批判了鬼神致霍乱的谬论，并应用中医理论阐述了霍乱的病因和病理变化。继《千金方》之后，唐代王焘集当代及唐以前的医学著作，汇编为《外台秘要》，全书四十卷，分列伤寒、温病、疫病、内科杂病、妇科、儿科、外科癰瘤、痈疽及五官眼、耳、鼻、口齿各科病证一千零四种，对各种病的证候机理论述详尽，并注重从临床实践验证，对发病机理的认识十分中肯，临床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代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和研究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陈无择在病因方面提出了三因学说，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共十五卷，阐述了三因致病学说。他将临床与病因相结合，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所因，即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内伤，内发脏腑，外形肢体；二为外所因，即风、寒、暑、湿、燥、热等六淫外邪，起于经络，内侵脏腑；三为不内外因，即饮食饥饱、虎狼虫毒、金疮痿折，疔疔附着，畏压溺等之类。三因说的实质，是从致病途径、发病机理结合临床表现而对病因进行分类，与后世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逸的分类法基本一致，因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使中医的病因学进入了一个较完善的阶段，为病因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宋代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著有《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该书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小儿生理病理的特点。在生理上提出了“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上强调了“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特点，后世吴瑭根据这些观点，概括为“稚阴稚阳”的理论。推而广之，为以后研究脏腑寒热虚实的病机变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此外，还有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以脏腑经络理论来研究妇科病机，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脏腑病机的内容。

金元时代，出现了中医学最早的学术流派。在公元十二世纪，出现了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两个流派。在公元十四世纪，涌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著名医家。其中有代表性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的学术主张和临床实践各具特色，对中医病因病机学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刘完素倡导“火热论”，因其火热主病，故用寒凉药，后世称为“寒凉派”。他

钻研《黄帝内经》数十年，对运气学说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认为研究运气应着眼于风、寒、暑、湿、燥、火对疾病发生发展及疾病流行的影响。鉴于当时在北方地区流行热性病，他分析研究《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强调了火热致病的理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在所著《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说：“风木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热动则风动。”同书《火类》又说：“积湿成热。”指出六淫邪气在疾病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而最终的归宿是火热。他补充了燥邪的病机，提出：“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他还指出了“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理论。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中说：“五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情之所伤，则属火热”。这些理论使后世的火热病因病机更加完善和具体。

张从正，其学术思想是“主邪论”。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无论是在天之邪（风寒暑湿燥火），在地之邪（雾露雨雹冰泥），或水谷之邪（酸苦甘辛咸），这些致病因素都非人身所素有。他在《儒门事亲》中说：“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一经致病，就须攻除。又提出“邪去而元气自复”的观点，故主张“祛邪务尽，攻邪从速”。遵从并发展了《伤寒论》的汗、吐、下三法，峻药逐邪，邪去则正安，世人尊其为“攻下派”。

李杲，其学术思想是重视脾胃，他继承张元素为首的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发挥了张元素脏腑辨证之长，进一步区分了外感内伤发病不同，创内伤脾胃病学说，著成《脾胃论》。他根据《素问·玉机真脏论》提出的“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六腑之本也”，及《素问·平人氣象论》所言的“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等以胃气为本的理论，提倡“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机理论。总结出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和精神刺激是内伤病的主要原因，气血失调、升降失常、脾胃受伤、元气失养是内伤诸病的基本病理变化。他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说：“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还论及了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等等。为此创立了以补脾胃为主的治内伤病的治疗方法和方药，后世称他为“补土派”。这一著名理论为内伤发病之脏腑病机变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堪为世人所遵，并对临床各科辨证均有影响。罗天益所著的《卫生宝鉴》，可以说是全面继承了李杲之学，又加以发挥。如论其脾胃所伤尚有“饮”与“食”之分；论其劳倦所伤，则虚中有“寒”与“热”之辨。比李杲之说，精详有加。

朱震亨，受到刘完素“火热论”的启示，对火热病因病机的认识和治疗经验均有独创，是前人所未涉及。刘完素和张从正论火热，着重于外来之邪，故偏寒凉而重攻伐，朱氏侧重研究人体内在火热的化生。他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壮火食气，少火生气”的理论，倡“相火论”，他论证人身相火有常有变，正常的相火是温煦脏腑，助生长发育，维持全身气化的动力。他在《格致余论·相火论》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这是他强调相火对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体现。但他也同时指出，相火易受情志、色欲、厚味等因素的影响而有相火妄动，提出“凡气有余便是火”，谓人

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发生疾病时，则易成相火妄动，相火妄动则五脏精伤，表现为阴不足，阳有余的病机变化，因此制定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和方药，世人称他为“养阴派”。因此，朱氏还在《丹溪心法·六郁》中提出了“六郁”说，即“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六郁，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这些理论对病因病机学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明清以来，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在各学派中，从各种内、外致病因素和体质情况来阐述各种病证机理的诸家，蜂拥而起。其中，以研究命门学说、瘟疫、温病学说而促使病因病机学说的发展更为突出，更为全面。明代赵献可、张介宾等提出命门学说。赵氏倡“命门之火”是人身之本，强调命门火之重要性。赵氏认为命门在两肾之间，命门的功能，就是真火，并把命门喻为“走马灯”中之灯火，他说：“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张介宾则认为两肾皆属命门，他在《类经附翼·求正录·三焦、包络、命门辨》中指出：“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生死是窠。”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强调说：“命门为元气之根，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命门一衰，全身阴阳皆亏，这些理论观点，不仅把命门的概念在中医理论中得以确定，而且给肾阴肾阳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对研究脏腑病机也是相当重要的。

明末吴有性所著的《温疫论》，对传染病病机的贡献很卓著。吴氏根据当时疫病流行的情况，首倡“异气”说，在《温疫论·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又称“杂气”、“疠气”。他首先肯定了“感天地之疠气”为温疫病的病因；“邪从口鼻而入”为侵入途径；“无论老少强弱，触之即病”为传染性；“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为传染方式。并指出疠气即杂气之一，有甚于他气，发病危急重笃者为“时行疫气”；其时偶有所患，发病纤悉相同者为“常年之杂气。”同时，认识到“温疫与伤寒有霄壤之别。由此可知，当时吴氏对传染病病源及不同性质的传染病，已有深刻的体会和研究。尤其突出的是他的学术见解，不仅突破了前人关于传染病、温热病之病因局限于“六气”的旧概念，更重要的是比起在十七世纪中叶才出现的细菌学还要早一百多年。《温疫论》成为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对世界医学作出重大贡献。继之，清代戴天章论瘟疫，既宗吴有性，而又有所发挥，所著的《广瘟疫论》首将“温疫”改为“瘟疫”，着重指出“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症之始”的观点，以病因、病机之殊，而概“辨气、辨色、辨神、辨舌、辨脉”之理，使医者于瘟疫之初就能与伤寒作出鉴别诊断，以正其误。另有刘奎评释编撰《温疫论》著成《瘟疫论类编》，其理论条理清晰，提出“毒气与瘟疫相为始终”而别立“疫毒”之因，并列举具有传染性而又程度不同的传染病证近七十种，可称之为论疫的全书。余霖《疫疹一得》，以火热疫气为因，认为火为疹之根，疹为火之苗，创造的“清瘟败毒饮”成为名方，迄今临床应用甚广。

明清时期温热病病机的成就：继金元时代刘完素“火热论”、吴氏“杂气说”之

后,清代温热病学发展与日俱增,温病学派的兴起为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其中以叶桂、吴瑭、薛雪等医家最为著名。叶桂论温热,首倡“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再根据卫气营血之部位及其间“顺传”、“逆传”的传变规律,概括为“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四个不同阶段的证治机理,从而创立“卫气营血辨证纲领”,为揭示温病的本质作出了贡献。吴瑭著《温病条辨》一书。他根据“河间温热须究三焦”的论点,加以发展而提出温病三焦辨证论治的理论,即“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他把温病分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九种。

薛雪惟善治湿温病而著《湿热条辨》,他以“天之热气,地之湿气”为湿热病因,对发病机理则指出“素有太阴内伤,湿饮停聚,”若“客邪再至,内外相引”而发病;对湿温病的演变趋势则认为:阳明、太阴先受病,而后“直趋中道”,归于“膜原”,且诸脏皆可病。这些病因病机的论述为湿温病的辨证论治以及“湿热伏邪”说,均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士雄撰《温热经纬》,宗《黄帝内经》、《伤寒》及叶、薛诸家之学,尤其深入研究暑、湿、火三气的性质,并有发挥,他所撰写的《霍乱论》,实际上对急性胃肠炎与霍乱在病机、证候及流行规律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鉴别。

温热病学说理论的创立为研究外感热病开辟了新的途径,使病因病机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明清时期,对脏腑病机的研究创见亦颇多。明代张介宾精研《黄帝内经》三十年,他在《类经·序》中说:“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他将两书合纂,将内容分别归类,著成《类经》三十二卷。并撰有《类经附翼》四卷,他在《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中提出了“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著名论点。他是针对朱震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论述人体阴阳之关系的。张氏通过“形气之辨”、“寒热之辨”、“水火之辨”,指出了“阴以阳为主”。“形气之辨”认为,“阳化气,阴成形”,形体之功能为阳气,人死后,形存而气去。这种阳脱在前而阴留在后的状态,正是阳常不足的结局。“寒热之辨”认为,阳气是自然界生长发展的动力。“水火之辨”认为人体“生化之权”皆由阳气。在生命过程中,真阳主“生发”,真阴主“成形”,它们互根互用,不可独存。“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由此可知,在发生疾病的时候,阳气不足的功能衰退或阴精不足的病理亏损,总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另外,他重视命门,把真阴看作阳气的根本。认为阴虚证和阳虚证的病机变化分别为“阳中之水亏”和“阴中之火衰”来阐发脏腑、阴阳、气血、水火等病机,可谓全而不乱,详而不杂。薛己为明代大临床学家,尊崇张元素的脏腑寒热虚实之辨和李杲的脾胃学说,继承王冰、钱乙之说阐发肾中水火之长。所搜集的《内科摘要》,主要突出了五脏辨证的原理,并用脾、胃、肾和命门的病机特点来论述内科病证,寓理深刻。李中梓著《医宗必读》等多部医籍,提出了先后天理论。《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说:“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肾为脏腑之本,十

二经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始者也”。他高度概括了脾肾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李中梓还强调指出，对虚劳证重在补脾肾。这些论点，对分析脏腑虚证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根据。叶桂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绮石在《理虚元鉴》指出，“阳虚成劳统于脾”、“阴虚成劳统于肺”、而“阴阳诸虚劳损的病机统于肺脾肾”，专“论虚”是其病机特点。王泰林之《西溪书屋夜话录》，对肝胆病机之专论，无不对脏腑病机学说各有阐发。最突出的是唐宗海《血证论》，著有“脏腑病机论”专篇，不仅从各脏腑之主气、经脉、部位及特点等方面论述各脏腑的常见病证及其病理变化，而且还讨论了各脏腑之病机与血证的关系，实践证明，这样将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与其病证反映、病变机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中医病机学说整理提高的较好途径。

明清时期气血病机的研究：自《黄帝内经》以来，历代医家对气血病机的论述，多从脏腑经络病证中进行阐明。故明清以来，虽以气血病机为专著者不多，但在其临床各科丛书中，以专题论述者有之。明代龚廷贤的《寿世保元》论及气血病机，强调“以气为主”，提出“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滑，气寒则血凝”的生理病理机制；治疗上主张：“调气为上，调血次之。”对临床辨证施治有指导意义。明代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注重从“气”、“火”之因来阐明“血宜温而不宜寒”、“血宜静而不宜动”、“血宜养而不宜损”的机理，对后世很有启发。清代喻昌的《医门法律·大气论》，倡“大气”之说，而阐发人身的阴阳，气机的升降出入机理，其后张锡纯引申其义，来阐述由心、肺之疾所变生的所谓“大气下陷”机理和治疗，确有创新。此外，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强调“命门元气”之存亡是关系到疾病的轻重缓急以及预后的关键；林佩琴《类证治裁》以情志、寒、热、劳来阐述“九气”为病的病理与证治；何梦瑶《医碥》论脏腑、经络气机郁滞的机理时，总结了“气滞必痛”，“不治其火则气不降”，“不治其痰则气不行”的经验等。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气血病机学。至清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又持中西汇通之学的唐宗海，将所有的血病分为“血上干”、“血外渗”、“血下泄”、“血中瘀”、“吐血”、“呕血”等三十三证，又论及“失血兼证”、“与失血有关诸症”；在病理上提及了“水病累血”，“血病累及气”等许多新观点。其所著《血证论》也是一部研究气血的重要著作和好的临床参考书。另外，王清任著有《医林·改错》，他非常注重气血病机，认为“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在他所载的诸病证中，多从气滞血瘀和气虚血瘀两个方面来论其病机。所拟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均属补气、理气、活血、化瘀的名方。为现在“活血化瘀”、“理气活血”等治法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关于经络病机，历代医家亦有阐发。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博采前人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整理而成的《奇经八脉考》，不仅详述八脉的生理、病理以及循行路线，还结合该经所主病证，广引《黄帝内经》、《难经》及历代各家的论述，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阐发精详。特别是对每一条经脉的发病机理，补注得更为精确，是一部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著作。还有，徐灵胎之《回溪脉学》认为十二经脉的发病机理是“脏腑为本，经络为标”；而十五络脉的发病机理，则为“各从经脉而